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1.023

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周大鸣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关键词:瑶族;人类学;学术传统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1-0168-06

本文主要以人类学在我国的沉浮发展为纲,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对粤北瑶族研究为目,兼顾其他人类学者的瑶族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并就新时代瑶族研究的走向进行分析。

一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创立时期

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核心元素,而田野调查又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在我国古已有之,如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对上古时期的人物故事遗迹进行了探寻,李时珍遍尝百草写成了《本草纲目》,徐霞客踏遍千山万水留下了《徐霞客游记》等。但对某一民族的专有调查却少之又少,历代王朝正史中只以“蛮夷传”等形式对少数民族作模板化刻板式记录,也有以见闻录形式进行记录的;但是在西方,很早就有探险者以及殖民者进入到异族他乡,尽管他们以猎奇的目光记录当地文化,但这却成为民族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前奏。当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以文明人看野蛮人的眼光来观察和描写我国少数民族时,如何客观公正地认识少数民族,纠正中国历史上和当时西方学者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成为当时一批有识之士的共识。五四运动之后,作为

科学的人类学,开始受到各方重视,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人们用以说明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用以了解国内外各民族的情况,加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抗拒列强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咄咄进逼。史地学界需要它作为一门改造旧史地学术的一门辅助性科学,使旧的传统史学和‘游记’式地理增强其科学性;施政当局也需要它作为了解国内各民族的历史社会、语言、风俗、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作为施政的依据,用以协调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以稳定各民族接壤区的社会秩序。”^①

中山大学的学者对瑶族的研究,开风气之先的是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辛树帜。1928年,他率队前往广西的瑶山进行了3个月的科学调查,同时也对当地瑶族的历史、语言、民俗进行调查,收集了一批文献,其调研成果作为《瑶山调查专号》在研究所周刊上发表。

以1928年为起点,20世纪上半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师生对粤北瑶族共做过四次调查。

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容肇祖、商承祚对乳源、黄茶坑进行了考察,开启了国内学者最早调查广东瑶族的风气。

1930年3月15日,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瑶山

收稿日期:2019-02-26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W201)

作者简介:周大鸣(1958—),男,湖南湘潭人,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①周大鸣:《梁钊韬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采集队一行 12 人对广东北江瑶山进行调查,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方桂博士随行。4 月 15 日,采集队成员集体撰写了《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该报告采集、观察到了北江瑶山的哺乳类、鸟类、爬虫类、两栖类和昆虫类动物,还探采了与岭南其他地方不同的 12 类植物。与此同时,对北江瑶山的风土人情之概况如社会组织、社会经济状况、瑶练、服饰、言语、歌舞等进行了粗略记载。这次调查的指向是北江瑶山的生物种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调查,但也记录了北江瑶族的社会文化,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索引和素材。

奠定中山大学瑶族研究基础的是一直主张坚持“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杨成志先生以及梁钊韬先生。1936 年 11 月 12 日至 18 日,杨成志先生率领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樑及文学院史学系本科三、四年级学生李秋云、罗比宁、刘伟民和宋兆联六位同学,由中大生物系黄季庄作向导,加上广州博物馆二位技佐,共十人,组成了北江瑶人考察团,由广州直达介于曲江、乐昌和乳源三县接壤的瑶族聚居区——荒洞,对以广东北江瑶人为代表的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展开调查。调研时间虽短促,但是由于黄先生熟悉当地情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调查最后形成了较为翔实的民族志《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并于 1937 年 6 月在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第一卷第三期刊出。其主要内容有: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Introduction、《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江应樑的《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广东瑶人之房屋及工具》《广东瑶人之衣饰》;王兴瑞的《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等共 11 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北江瑶人的体质、社会生活、生计模式、族属、精神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江应樑的系列著作把瑶族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反映出来了。王兴瑞的《瑶人经济社会》从人类学、民族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家族、姓、村、私有财产与贫富、婚姻制度、图腾遗迹等进行分析与归纳。刘伟民的《瑶人的传说与歌谣》反映了瑶族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是一篇简介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相结合的论文,分导言、人种的与史地的瑶人地位、瑶人的文化现象、瑶人的体质型与结论五个部分。

“1937 年 5 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联合组成桂北科学考察团,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担任该团民族组的主任,负责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研究瑶族的风俗习惯。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江应樑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调查。”^①抗日战争时期杨成志还与梁钊韬等人对粤北的过山瑶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体质、语言文化、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等。

1938 年,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被迫一度迁到云南,后来又迁回粤北的坪石。在危险的逃难路途和艰苦的生活里,杨先生仍不忘调查工作,1941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4 日,他率领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及助手顾铁符等再度深入粤北瑶山,到乳源乌坑等瑶山对瑶族的一支“过山瑶”进行调查,确定题目之后各人分头进行采访和观察,最后独立完成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涉及的范围广,既有历史、社会、经济、房屋、工具、服饰、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民间传说、歌谣,又有瑶族的体质特征。顾铁符的《粤北乳源瑶民的刺绣图案》经过核查今昔样本,加以分析比较和归纳得出 62 种刺绣的基本图案,反映了瑶族妇女手工技艺与智慧。王启澍的《粤北乳源瑶人经济生活》把浅山瑶 16 个村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概况介绍出来,梁钊韬的《粤北乳源瑶人宗教信仰》揭示了瑶人的宗教信仰是“神灵崇拜”“有灵崇拜”和“妖物崇拜”三者的混合,并非真正的道教。杨成志先生完成的文章是《粤北乳源瑶人的考察导言》及《粤北乳源瑶人的人口问题》。这次调查最后形成《粤北乳源瑶山调查报告》一书,于 1942 年出版。在坪石期间,杨先生还为中大文科研究所收集了好几箱的文物。在坪石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杨先生与粤北瑶族的一段苦难中的姻缘。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虽处于战争状态,但中大人并没有停止田野工作的步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杨成志先生的弟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前系主任梁钊韬先生,梁先生在 40 年代早期曾在广东省政府指导委员会任研究员,并担任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学概论》及业务实习课等。任职期间,梁先生多次赴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视察边政,并于 1943 年撰写了《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载于《大同》第 1 卷第 2 期),反映排瑶政治、经济、战争、宗教、婚丧等方面的情形,并主张通过扶持手工业、设立墟市、修建基础设施、发展商业,改革社会组织等方

^①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8 页。

式发展排瑶社会经济,从而革除排瑶社会存在的械斗与社会分裂。

20世纪上半期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为主体的研究力量对粤北瑶族进行的调查,最值得书写的就是多学科合作、调查范围广。这一时期的田野工作者都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从生物、历史、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对粤北瑶族的体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民俗乃至房屋建筑等都做了全面的考察了解,奠定瑶族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是粤北瑶族调查的开端时期。但也有其局限之处,如调查时间短暂,杨成志等人对北江瑶人地区的调查仅有7天;又如重文化收集整理,轻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因此,这期间的瑶族调查对人类学来说,其贡献主要体现在资料保存、现象描述与初步分析,为日后对粤北地区的再研究提供了历史参照。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同步进行瑶族研究的还有当时岭南大学的一批外籍教师。“1938年,岭南大学外籍教师霍真(R. F. Fortune, 1939)带领社会研究所的部分学生到连县(现连南瑶族自治县)油岭排调查瑶族生活情况,其成果陆续在随后的《岭南科学杂志》发表。”^①

二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停滞时期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院系调整,发源于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学科而取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也停办,部分教师改行从事历史学或哲学研究,学术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型,部分人类学者参与了中央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

这个时期瑶族研究总的情况是停滞不前。但在历史文献收集上却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体现在《瑶族简史》的出版,瑶族“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发行,《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1-9册)的出版,为后来的瑶族学者从事瑶族研究保存了一批丰富的历史文献,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学术信息,当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调查报告具有时代局限性,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进行甄别。

民族识别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部分人类学者参与了瑶族的民族识别,如费孝通先生在1951年率中央访问团访问广西时,就开始了瑶族识别工作。湖南省江华县瑶族的识别工作,始于

中央访问团1951年的访问。由于瑶族支系繁多,对该民族的识别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各级访问团在访问瑶山及开展民族识别期间,依据搜集材料,撰写了调查报告,如中央访问团对江华、江永平地瑶的调查报告,记载了一些独特的民俗和社会组织,尤其是对平地瑶“瑶长”制社会组织,婚姻制度做了详细的记录。访问团向民间征集的大批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为后来学者提供了详实可信的资料。1951年梁钊韬、容观瓊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第二分团到广东北江各地访问瑶族,梁钊韬发表了《北江瑶族的来源》,该文使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研究了瑶族的历史社会,成为该时期瑶族研究的一抹亮色。

三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恢复时期

(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的瑶族研究

1978年后,中国的教育重现生机,在梁钊韬先生的积极推动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于1981年迎来复办并获得首批博士授予权。前人开创的田野调查传统作为学术自觉得到传承。

1. 培养了大批瑶族研究学者

中山大学作为人类学研究教学的重镇,有着重视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1935年中山大学设立研究院,下设人类学部,由杨成志兼主任,那时开始就注意培养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江应樑、梁钊韬、曾昭璇等瑶族早期研究的学者就是这个时期培养的研究生。1948年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杨成志先生为系主任,开始培养本科生。如研究瑶族的著名学者李默先生就是人类学系第一届本科生。中山大学着力培养瑶族研究学者的传统,在人类学复办后得到继承和光大。目前在从事瑶族研究的学者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山大学培养的学生。他们正在不同的瑶族区域从事瑶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他们正在肩负起瑶族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7年,中山大学硕士生、博士生中以瑶族文化经济为研究对象做学位论文的就有21人。

2. 接续、扩大瑶族研究基地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学的发展步入了春天。中山大学的一批师生接续了杨成志、梁钊韬等老一辈学者亲历调查过的粤北过山瑶和连南八排瑶等田野调查点,进行追踪研究。如容观瓊先生,他的瑶族研究成就颇多,他对瑶族的历史文

^①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化,尤其是对《评皇券牒》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公认。1990年,68岁高龄的他还带研究生在粤北和湖南、广西边界地带的瑶山进行调查,对瑶族的迁徙和来源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又如杨鹤书教授,他主要研究八排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八排瑶的历史、现状、文化等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其代表作为《八排文化——八排瑶文化人类学考察》(1990)。

2000年以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师生对云南、广西、贵州、湖南以及广东的瑶族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如周大鸣教授带队参加了广西凌云、龙胜瑶族的调查,出版了《瑶族双寨——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是继1928年颜复礼、商承祖在凌云调查后的跟踪研究。在周大鸣教授支持的系列课题中,瑶族研究始终是重要的选题,希望瑶族研究继续成为中大人人类学学术的支撑点,进而以学术回馈瑶族人民,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目标!此外,博士研究生杨建银对广西凌云县瑶族村寨变迁的调研(2009年)以及何海狮对方峒瑶族家先的研究(2013年)等都接续了前辈学者的传统。

利用暑期开展田野实习是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学生的“成年礼”,在延续传统选择一些老一辈学者调查过的田野点进行回访开展追踪研究的同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还在广大瑶区开辟了新的研究基地,范围涉及广东、广西、湖南以及云南的瑶族社区,调研对象兼及过山瑶、平地瑶、排瑶等瑶族支系。从1981年到2015年8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每年都组织教师带领学生分赴大江南北进行田野调查实践活动,仅对广东、广西、湖南境内的瑶族进行的调查就达10余次。这些调查多由教授或副教授带队,每队由十几、二十几名本科生参加,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有时也参与其中。部分优秀的调查成果获得出版。如2004年的调研报告就结集成《瑶族双寨——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周大鸣,2010年)、《三水瑶区变迁的描述与探索:以改革开放前后为中心》(张振江,2010年)等。

3. 研究重点由文化研究转向瑶族社会发展研究

老一辈的人类学者对瑶族的研究受到以杨成志为代表的南派人类学的影响,侧重于社会文化

研究,因此瑶族的《过山榜》、《盘王大歌》、瑶族宗教成了研究重点。进入21世纪以后,中山大学师生对瑶族的研究在关注传统的族群认同,瑶传道教、民间文化的同时,聚焦点悄然发生了转变,转向了社会变迁与发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乡村都市化》这部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奠基之作中,周大鸣、郭正林就关注了瑶族社区的“都市化”问题。周大鸣教授主编的《瑶族双寨——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对山地瑶族的扶贫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作者把思考的焦点对准了造成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农村分割性现状的体制,并把造成瑶族山区贫困的终极原因归因于瑶族的无意识文化秩序”^①。《三水瑶区变迁的描述与探索:以改革开放前后为中心》,该书以经济为主线兼级三水瑶区的文化、社会组织等,总体上勾勒出了连山三水瑶族的巨变。杨建银的博士论文《“落后”与发展——广西背陇瑶的生计变迁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思考背陇瑶以及瑶族经济落后的内在原因。

(二) 其他学者的瑶族研究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者对瑶族的研究是瑶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广西、湖南、云南等地的一批人类学者也对瑶族开展了积极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

1. 瑶族宗教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瑶族的宗教研究是人类学者关注的热点。张有隽先生在广西十万大山山子瑶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写成了《十万大山瑶族道教信仰浅析》一文,文中他依据田野调查资料,把社会生活与瑶族宗教联系在一起分析宗教的功能,在瑶族宗教领域是一个突破。罗智智追寻张有隽先生的足迹,对大瑶山瑶族宗教群体权利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徐祖祥借助扎实的田野资料,对云南瑶族宗教本土信仰与道教信仰的关联性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瑶传道教”概念,把瑶族宗教信仰推向了新视野。张劲松、张泽洪等人对瑶族“度戒”“挂灯”等仪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在瑶族研究中是一个亮点。

2. 瑶族发展研究

解放前的瑶族研究,以梳理瑶族的历史文化及族群史,收集整理瑶族历史文献为主。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策转向经济建设,瑶族区域的发展也成了人类学者关注的点。费孝通先生一生六

^①陈敬胜:《21世纪初瑶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上瑶山,其关注的主题就是瑶族区域的发展,目的是帮助瑶族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胡起望与范宏贵的《盘村瑶族》,郭维利的《盘村变迁》,秦红增等人的《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徐平的《大瑶山七十年变迁》等都是研究瑶族发展的人类学成果。

3. 国际瑶族的研究

瑶族是跨境民族,除中国之外,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等地也有不少瑶族。在中国国门尚未打开之际,就有日本、法国等国的学者到泰国等地进行瑶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成果有“日本白鸟芳郎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竹村卓二的《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的《瑶族神像挂图》、泰国差博-阿南达的《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①。

改革开放后,邻邦日本、韩国的人类学者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开始了对中国大陆瑶族的研究。如2008年以来,日本神奈川大学的广田律子教授团队在湖南省文联及蓝山县乡土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对瑶族文化的“活化石”——度戒仪式,进行了持续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韩国的金仁喜博士、金荣在研究员对白裤瑶、花篮瑶的信仰,以及徐裕源、金善子对瑶族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给予了高度赞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与国家“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相呼应,中国人类学也开始把目光瞄准境外。广西瑶学会的研究员张有隽、玉时阶等人利用毗邻越南、泰国的优势,开始了对越南、泰国甚至美国瑶族开展田野调查。

4. 瑶族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

湘南也是瑶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相对于粤北、桂东风生水起的瑶族研究而言,湘南的瑶族研究则显得寂静。湘南瑶族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一批地方乡土知识分子对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上。如郑德宏对“盘王大歌”“瑶人经书”的收集整理,李本高对“过山榜”文献的收集整理及研究,任涛对平地瑶的研究,杨仁里、欧阳绪珍对江永四大瑶民民间资料的收集整理及研究都引起了人类学、民族学同仁的注意,他们的研究为后学的学术接力奠定了材料基础。

四 延续瑶族研究的学术传统

“学术和政治,从来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类学在发展中遭遇的起转沉浮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轨迹相契合。”^②与中国社会科学焕发出的新生同步,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也走过30多年的历程。这期间研究瑶族的人类学者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聚焦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取得了累累硕果,为南岭走廊甚至全国的民族研究都奉献了智慧。但其中也透露着遗憾,如孤立性、封闭式、地方性研究过多,跨学科、跨地域研究不够。

笔者认为,今后的瑶族研究应接续我国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瑶山,把脉瑶族区域瑶族群众在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着力进行跨界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与交流,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1. 与瑶族地区的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③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决胜小康社会阶段,小康社会的难点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和民族地区。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也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南岭走廊山区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地,有些区域属特困连片地区,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有些区域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瑶族是个智慧的民族,富于创新性和创造性。新时代,瑶族区域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发生或正在发生巨变,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扶贫模式和社会治理智慧以及乡村振兴方略,如何总结提炼瑶族群众的地方性智慧,需要人类学者运用发展人类学的视野进行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后扶贫时代,当代瑶族研究要立足瑶族社会的发展,与扶贫结合起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关注变化中的瑶族社区及其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2. 加强海外瑶族的研究

瑶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饱经辛酸和不断迁徙的民族,国内瑶族人口有260多万,主要分布在湘粤桂三省区交界的南岭走廊山区。此外,还有60多万瑶族散居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欧美的美国、法国以及澳大利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瑶族文化同源,族群同根,他们迁徙的原因,在

①秦红增,玉时阶:《南岭走廊与瑶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②周大鸣,吴宇:《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③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文化与血缘上与中国境内瑶族的关系都是人类学者关注的话题。围绕这些主题,“向大有的《走向世界的瑶族华人》、张冠梓的《关于国外瑶族的分布与变迁》、张有隽的《瑶族向国外迁徙的原因、过程、方向和路线》等”^①进行了讨论,但“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中的‘新移民’讨论都显得匮乏”^②。在新的国度里瑶族是如何与当地主流民族进行互动,在新的政治经济语境中如何认同新的国度,他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认同自己昔日的祖国,这些都是值得注意和关注的研究主题。中国的快速崛起,“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投身到海外广阔的市场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学研究,跨文化、多区域、多点的田野调查,成为时代推动下的必然产物”^③,也为国内人类学者到海外从事瑶族研究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3. 加强城市流动瑶族的研究

瑶族有流动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地缘上与珠江三角洲接近,加上受城市“拉力”和瑶族村寨“推力”的影

响,瑶族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边缘自由散工。这些流动到城市的瑶族,如何融入城市,为了融入城市他们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在与城市文化的适应过程中,自身的族群文化发生了什么改变,以及瑶族劳动力的流动给当地瑶族村寨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都是需要高度关注的话题。

人类学传入中国已逾百年,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亦跨越一个世纪。回眸一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学瑶族研究历程,大体上可分为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两个界限模糊的阶段。改革开放前的瑶族研究可归属于人类学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人类学的瑶族研究逐步转向应用人类学,重点是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则可归于第二阶段。在后扶贫时代,我们应自觉传承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从新的历史出发,传承和弘扬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精神,立足南岭走廊,扎根中国大地,自觉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观、比较观,做扎实的田野研究,跨区域跨学科研究,把瑶族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The Academic Tradition and Continuation o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Yao Nationality

ZHOU Da-mi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Yao nationality has gone through 90 years in the sense of modern anthropology. Tak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Yao nationality sort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s the main line, it can be found that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is the academic tradition to study Yao nationality by anthropology, and the ethnography writing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Yao nationality, together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Yao region.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on Yao nationality should continue the excellent academic tradition of anthropologists to keep a foothold in the field and lay the roots in the land of China. It should identify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Yao nationality,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field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the dialogue with anthropolog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o provide the service for the ongo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Yao nationality; anthropology; academic tradition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丁宏等:《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开题实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

②丁宏等:《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开题实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

③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人类学发展新趋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